

MUSIC

音乐论著丛书

面临挑战的反思

戴嘉枋音乐文集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MUSIC

音乐论著丛书

面临挑战的反思

戴嘉枋音乐文集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临挑战的反思: 戴嘉枋音乐文集 / 戴嘉枋著.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4. 10

(音乐论著丛书)

ISBN 7-80692-087-0

I. 面... II. 戴... III. 音乐史—中国—现代—文集 IV. J6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1077号

丛 书 名 音乐论著丛书
出 品 人 洛 秦
书 名 面临挑战的反思
著 者 戴嘉枋

责任编辑 洛 秦
特约编辑 蒋祖清
封面设计 陈 舫
责任校对 蒋祖清
电脑制作 吴顺奇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汾阳路20号
邮 编 200031
电 话 021-64315769 64319166
传 真 021-647104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大学世纪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2100
开 本 889×1194mm 1/32
字 数 228千
印 张 9.75
书 号 ISBN 7-80692-087-0/J·80
定 价 21.00元

目 录

1	自 序
	对音乐史学原理论的若干思考
5	从音乐史学的对象、性质谈其存在价值
8	继承、扬弃与发展 ——论音乐史学多元化观念的萌生及其合理内核
	20 世纪中国音乐史研究
21	面临挑战的反思 ——从音乐新潮论我国现代音乐的异化与反异化
50	科学总结我国当代音乐发展的历史经验 ——与吕骥同志等商榷
76	时代与现实错位阴影中的必然选择 ——新潮音乐的得失生成及历史方位

86 论新兴音乐中的传统文化心态

94 中西音乐结合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20 世纪中国音乐家及作品研究

98 无尽奇珍供世眼 一轮圆月耀天心
——李叔同——弘一法师生平思想暨出家因缘论析

139 在启蒙与救亡中的自主选择
——试论马思聪在三四十年代的音乐思想

156 时代的丰碑与历史的遗憾
——论郑律成的合唱歌曲创作

168 论歌剧《阿依古丽》在音乐创作上的成就

189 积极进取的生命赞歌
——评大型清唱剧《生命宇宙的春天》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198 俗乐观与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观的层次构筑

215 “正中和”与“静远淡虚”
——七弦琴艺术音乐美学思想初探

- 242 《流水》的流变与“传统音乐”的观念
——“传统音乐”研究札记之一
- 259 从系统论看中国传统音乐单声体系的长期延续
——“传统音乐”研究札记之二

读史偶记

- 283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家传记？
——读两本冼星海传
- 289 文学性传记写作也应求实存实
——暨与刘熊同志商榷
- 292 人的历史 历史的人
——读《张寒晖传》
- 295 从文化史角度审视古代音乐
——读《古乐的沉浮》
- 299 文史并茂的乐苑回眸
——读廖辅叔先生《乐苑谈往》

自序

这本论文集,收录的是我自1981年至1997年间,在中央音乐学院求学,及其后在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从事中国音乐史教学、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中期间,陆续在一些音乐理论刊物上发表的部分有关中国音乐的论稿。1996年至2001年间,因奉调任职于文化部教育司,成为了政府公务员,不仅由于公务繁杂,难以静心进行学术上的思考,浮躁之中即便偶得的片见断想,也难见方家,不足面世;更虑于身份的改变,一旦发表论文惟恐给人产生误导,因此学术论文的撰述暂时中断了一个时期。

论文集中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家传记?——读两本冼星海传》、《文学性传记写作也应求实存实——暨与刘熊同志商榷》、《“正中平和”与“静远淡虚”——七弦琴艺术音乐美学思想初探》及《论歌剧〈阿依古丽〉在音乐创作上的成就》,均为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本科期间所撰写的。其中《“正中平和”与“静远淡虚”——七弦琴艺术音乐美学思想初探》是冯文慈先生所授中国古代音乐史课程修毕时的论文试卷;《论歌剧〈阿依古

丽)在音乐创作上的成就》则是由徐士家先生为指导教师的毕业论文。我很难忘记当年师长们在论文写作上给予我的诸多珍贵的帮助,尤其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家传记?——读两本冼星海传》,当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副主编的汪毓和先生和编辑黄旭东先生,不厌其烦指导我进行修改,先后达七次之多,现在回想起来,其关爱之情依然令我难以忘怀。

其后我的一些中国音乐论稿的撰写年代,正值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文化领域极其活跃:“新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引进、“传统文化热”研究的掀起,以及音乐理论界对于“民族音乐学”与传统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异同讨论、对所谓“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关注、中国音乐史的“回顾与反思”等等,这些与中国音乐研究相关的学术上的新思维、新观念、新方法、新成果层出不穷,使我获益匪浅,并对我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学习和从事的是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历史学家的治史任务,一是要说清“历史是什么”——以史料来描述历史的原生面貌;二是在此基础上说明其“为什么”——阐明这些史实何以产生的原因,并作出恰当的历史评价,由此也就构成了史学的史实和史论两大部分。对于这些不断深化中的认识,先后形成了对音乐史学原理的论文《从音乐史学的对象、性质谈其存在价值》及《继承、扬弃与发展——论音乐史学多元化观念的萌生及其合理内核》。

但是,就个人兴趣而言,当时我注重的还是后者,即对于既成史实的来龙去脉探究充满了更多的热诚。历史研究的神秘和迷人之处,就在于历史进程中,无论是人物、作品还是事件、现象,其发展变化实际上充满了多种变数,存在着可供多样选择的可能,而为何当时的当事者恰恰作出了形成如今史实的抉择?其

合理内核究竟是什么?由此体现在我对于音乐人物的研究上,较多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物命运和思想性格的演变,及其届时音乐创作的关系。如《无尽奇珍供世眼 一轮圆月耀天心——李叔同——弘一法师生平思想暨出家因缘论析》、《在启蒙与救亡中的自主选择——试论马思聪在三四十年代的音乐思想》、《时代的丰碑与历史的遗憾——论郑律成的合唱歌曲创作》等有关音乐家及其作品的论文,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时代思潮和现实生活对于他们个人命运、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的影响。而对于历史上的音乐事件、现象、思潮或观念的发生及发展,则力求与传统文化和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进行联系,从中去寻求并力图解答其之所以如此生成发展的缘由。其中既有《面临挑战的反思——从音乐新潮论我国现代音乐的异化与反异化》、《科学总结我国当代音乐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吕骥同志等商榷》、《时代与现实错位阴影中的必然选择——新潮音乐的得失生成及历史方位》、《论新兴音乐中的传统文化心态》、《中西音乐结合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等那些由当时现实音乐生活现象引发的一些历史性思索;也包括如《俗乐观与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观的层次构筑》、《〈流水〉的流变与“传统音乐”的观念——“传统音乐”研究札记之一》、《从系统论看中国传统音乐单声体系的长期延续——“传统音乐”研究札记之二》等,从既存传统音乐形态探究其生成延续缘由的论文。

正因如此,其间生成的这些论稿,不仅某些内容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而且篇幅都较大,加上我的文字表述有时不够精炼,不乏冗长之嫌。但在当时音乐理论刊物还较少、版面紧缺、论文刊登不易的情况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人民音乐》和《音乐学习与研究》还是多次刊用了拙文,使其得以面世,对此我不能不对这些刊物的编者由衷地感谢。

所以,论文集集中的上述论稿既记录了我早先时期在中国音

乐史研究中的一些思考，更存录了众多前辈师长和刊物编辑对我的提携和关爱——包括曾就中国现代音乐的异化问题对我进行过尖锐批评的已故吕骥、赵沅、李业道等先生，尽管在某些学术见解上我们彼此存在着相异乃至对立的看法，但他们曾多次给当时尚年轻的我提供学习和求教的机会；在一些公开和私下场合，由衷希望我能提高自己的“认识”；并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方面，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与鼓励。念及往昔，不胜唏嘘之余，对他们将掖后进、望我成才的拳拳之心，犹存谢忱。

从刊物掇拾旧稿，对于自己治学上的稚拙和浅疏不免汗颜。尤其是早先年间撰著的许多论文的引文和注释，一则当时尚无严谨的学术规范要求，二则刊物版面紧张，即便有详尽注释也多半在发表时予以删除，故少有明确所引用出版物出处的。本想借此机会全部重新加以校订，无奈原手稿均已散失，文中所引用的原著也难以一一回忆，此次只能在可能的情况下作了一点校订和补充，其他的只得尚付阙如，所遗缺憾，有待今后治学时自戒警勉。同时，鉴于论稿是我这个时期心路历程的记录，为求真存实，此次结集出版除极个别地方为求文理通达，稍作文字调整外，文章未作任何删改，以取其完整原貌。

承蒙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的厚爱，使得这本文文集得以面世，在此一并致谢！

2004年4月9日
谨识于中央音乐学院

从音乐史学的对象、性质 谈其存在价值

一个也许令人诧异、却又确实存在的现状是：我们绝大多数的音乐史学工作者，似乎对音乐史学是讲什么的？究竟什么是音乐史学？特别是它存在的目的，即音乐史学的对象、性质、价值等属于音乐史学方法论中元理论范畴的观念十分模糊。而它们作为音乐史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恰恰是音乐史学在科学化、系统化发展过程中一个亟待明确的问题。

众所周知，音乐史与音乐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历史，是指已经过去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个人的经历”^①，是客观社会的存在。针对音乐史，当是指客观存在过的人类的音乐活动及其发展过程。而所谓音乐史学，则是音乐史学家以客观存在过的音乐史为对象，进行专门研究的一门学科，是客观历史存在于史学家头脑中的反映，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史学家的主观因素。

音乐史学既然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就必然赋予其自身的本体性质。这些性质我认为至少应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就

其确定的“对象”性质而言,它不同于具体探索某一部分文化特点和规律的人文学科,而是应研究整个音乐文化的发展过程,即音乐文化历时展衍中的连续性,应当是音乐史学最主要的着眼点。其次,音乐史学是科学,“一般地说,科学并不在于把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收集起来并把它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加以整理,而在于把握我们所不知道的某些东西,并努力去发现它”⁽²⁾。诚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每一种科学都是分析单个的运动形态或一系列互相关联互相转变的事物的运动形态的。”也就是说,音乐史学不仅要回答音乐历史“是什么”,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还应探索其“为什么”,从前因后果中记述阐明某种音乐文化必然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发展过程。再次,如果承认音乐是人类文化创造的一门艺术,音乐史从本质上是音乐艺术史,那末音乐史学的主线无疑应当是人类在音乐审美创造与审美实践中的历史发展过程。

对于音乐史学的存在目的,由于以往我们对其对象、性质的认识不甚了了,加上传统的以及人为的一系列政治因素,导致了“古为今用”成为其惟一的价值观。应该看到,鉴往知来,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当前的警戒,始终是我国史学的传统。与此相辅相成的,则又是提高民族自信力、发扬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手段。显然,在音乐史学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中,我们素来重视的是它的社会功能、社会作用,并视其为它生命力的惟一源泉。然而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单纯地追求“古为今用”的史学价值观是不正确,至少是不全面的。正因为史学并非纯客观的社会存在,而是史学家对以往历史的反求构筑,在选题、论述上带有主观性,所以它必然要受到当前各种社会因素的干扰与影响。从我们的“史学为现实服务”、“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直到“影射史学”顺理成章地出笼,不难发现其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滑坡起点,就在于我们完全将屁股挪到了社会价

值一边！我认为，音乐史学的社会价值固然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的连续性规定了“过去”与“今天”存在着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密切关系，史学也同样有机地将历史与现实联系在一起。然而，史学所产生的社会功能、社会作用，是以它的学术价值体现出来的。完全忽视史学学术价值的独立发展，为适应一时一事的现实需要，将历史看作是一个可以任其选择裁剪的衣料库，挑挑拣拣地去拼凑出一件赶时髦的应时新装，甚至不惜违背历史真实，那末这种违背客观历史的研究尽管也许会昙花一现，但它毕竟经受不了时间的考验，它的社会作用也是短暂而有限的。可见，史学的社会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倘若过分强化，就可能产生价值判断与价值本身的背离，在对史学科学性的亵渎中使史学的独立品格湮没泯灭，从而最终降低本身具有的社会效用和威信。因此，对于音乐史学的存在价值，我认为是否可以认同为：音乐史学的任务是通过对人类音乐文化历史发展过程动因和结果的系统科学阐述，达到音乐文化积累和传播的目的，使人们在不断完善和健全对音乐艺术发展途径的自我认识中，增强后人创造新的音乐文化的能力，这也正是音乐史学的价值所在。

(1) 《现代汉语词典》第 776 页，商务印书馆 2002 年 5 月修订第 3 版。

(2)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 9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 4 月第 1 版。

(原载《中国音乐学》1989 年第 2 期)

继承、扬弃与发展

——论音乐史学多元化观念的萌生及其合理内核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在音乐史研究中，目前正萌动、汇聚着一股新的潜流。一部分音乐史学家，包括一些在学的音乐史专业的学生、研究生，受新的文化思潮的渗透影响，开始探求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与之相应的数理理论等新方法，将音乐史学与哲学、美学、心理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进行综合研究，力图以历史文化系统意识观照我们的音乐史。这一在其他史学或文艺理论领域也许已不新鲜，于音乐史学却还颇为生疏的新观念，虽然引进伊始，眼下还多停留在思考或“述而不作”的阶段，见诸于报刊的还常仅就音乐史学方法的本身，提出零星的感想式的探讨^①；即使偶见结合具体研究实践的探索性论文，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演释如何更加清晰、严谨，表述更为准确、易解，以及进一步加强宏观立论与微观探研有机联系等一系列问题^②。然而，我们如果不以一时功利得失苛求这些起步中难免的不足，能从方法论的意义上对这种新的音乐史学观念作一公正的审视，那末我们

将难以否认，它的出现无疑是我们原有音乐史学观念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以其多元化的本质内核，以及由此所规定而具有的开放机制，不仅将对原有的音乐史学观念作出合理的扬弃，并在这种积极的继承中发展、壮大自己，从而凭借自身宏容健全的体魄，使我们的音乐史学走向更为广袤深远的未来！

所谓的音乐史学多元化，若要给予一个概念上的界定，那就是在确认音乐史学无论就主体（音乐史学家），还是客体（音乐史），都是异彩纷呈的多元世界的前提下，视音乐历史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通过不同音乐史学家各自相异的认识能力的能动发挥，对音乐史进行不同规模、多层次、多方位、多截面的观测研究，而后从整体上达到对音乐文化历史更真实、更全面、更准确的科学认识和规律总结。

音乐史学多元化观念的萌生，是音乐史学家们在新的文化思潮中，对沉闷、落后的音乐史学现状反思的结果。联系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音乐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尚为年轻，但从其建立于本世纪以来，尤其在建国以后，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通过几代音乐史学家的辛勤劳动，积累了丰硕的成果：首先是对我国浩若烟海的音乐史料，在进行了大规模搜集整理的同时，还作了大量的辑注今译、辨伪考证的分析研究；其次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初步建立了中国音乐从古代到近现代的通史体系框架。这些由无数心血凝聚而成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人们了解、热爱我国源远流长的音乐文化，使之发扬光大，提供了具体的历史依据，而且，这些成果，包括孕含其中的研究方法和思想火花，也使每一个研习中国音乐史的后来者深受教益。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因观念上的陈旧和方法的贫乏，现已趋于踟蹰徘徊的困境。中国音乐史以往的研究方法，一是来源于我国传统史学，即以政务记录、帝王家谱、王侯世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化史学，以及这种政治化史学的另一

生成物——在清王朝政治高压下畸形发展起来的乾嘉考据学派,其特点是重史料的搜集、整理、编纂,并通过辨伪考证确定史实。来源之二是 50 年代初苏联的以直观形态为基础的反应论史学模式,即以阶级斗争为社会生产关系集中反映的范式为参照系,以此作为史论的出发点,同时在认定意识形态(包括音乐艺术)作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前提下,将前者同后者呈直接的线性因果关系为惟一的史论推研依据。正由于传统史学对社会政治的偏重,在借鉴苏联史学模式中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片面理解,加上长期左的政治思潮的干扰,综合而成的“政治化”音乐史学观念,使中国音乐史的史学研究从对象、目的到具体方法,都逐渐走向狭隘化、单一化。在研究对象上,除从事史料研究的,直接秉承了传统考据学派,一般就具体史料作训诂、校勘、考据与注释今译而远离社会政治外,其他的研究都过分重视历史上音乐现象、事件、流派及人物、作品的政治属性,对象的选择与评价的褒贬也多以社会政治效果推断为依据,并往往由此替代为音乐史的全貌。这种同政治过分贴近导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观念,使我们的研究对象长期局限在一个“进步阶级”的狭窄圈子里,从而给以反映音乐历史真实全貌为己任的史学本体造成极大的局限性。如以往对重社会伦理效应的儒家音乐思想同讲究“自然无为”但内涵丰富的审美规律的道家音乐思想在研究评价上的偏颇;以及对某些革命音乐家无视其不足而一味盲目褒扬,对一些“资产阶级”音乐家给予的却是不公正批判和研究的忽视,就是明显的例证。同样,中国音乐史的研究目的,尽管史学家们一致表明是为了探索和阐明其发展规律,供当代音乐文化建设作参考借鉴,但实际上受左倾政治思潮的长期影响,史学与当代的关系在我们的观念中是本末倒置的,我们常在强烈的现实政治倾向中去观照历史,并决定对此的评价,这种附庸于一个不断变幻其形态的音乐史学的立足点,极

大地妨碍了我们对中国音乐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不要说以史料考据为对象的史学研究，因其本身往往限制在某一具体史实上，很难体现总体性的规律，从中要加以阐述固然难以谈起，即便在我们的史论或已构成音乐史发展线索的专著、通史中，它们所阐述、总结的所谓发展规律，也多照搬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一般社会形态发展的政治理论，使人难以了解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与政治、经济及其他文化领域究竟有什么不同？自然，由此也就很难称得上切实的探索与科学总结。不仅如此，有时为了突出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作用，迎合某种需要，甚至不惜歪曲、篡改史实，使音乐史学堕落成为“影射史学”，从而完全改变了音乐史学本体的存在意义。因为受到政治化史学观念的观照及研究对象、目的的约束，在我们音乐史研究的具体方法上，就必须形成一种以直观形态为基础的单一化体例程式：若要考察评价历史上某一音乐家及其作品，一般依时代背景、个人生平、创作思想、重要作品暨技法分析、产生的社会效果及作用等八股程序，继而的评价则是一些笼而统之、可供多人借用的浮泛套话；对历史上某一流派、现象乃至断代史、通史，所运用的也只是这种程式规模、程度不同的相加或放大。长此以往的结果，是中国音乐史的史论文章，常常是众口同词、千人一面。为数不少的通史教材，也除引用的史料稍有不同侧重外，都似曾相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已开始不得不依赖于新的史料发现与考古的发掘。虽然近年来，随着极左思潮的被清算，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在原有的对象上有所深化与扩大：如考据领域中的古代律调理论、古谱翻译、史料及考古；史论领域内对古代音乐思想的研究与阐发、近现代某些曾遭贬抑的音乐家及作品的重新评价等，都取得了不容忽视的进展。只是毋庸讳言，从方法论来看，我们仍不同程度地囿于固有观念的窠臼之中，尤其在史论领域缺乏根本性的开拓，已有的成果难以持续地深入，